

唐太宗和武則天

(記錄稿)

汪 錢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歷史教研室

一九六四年六月

說 明

〈唐太宗和武則天〉，是根据汪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二十一日給我校一九六一年班的报告記錄整理的。唐太宗部分經過汪錢同志修改，个别地方与原来报告內容稍有出入，武則天部分則未經修改。汪錢同志提出，他的許多意見还不成熟，文字也未注意修飾，希望不要外传。

历史教研室

一九六四年六月

22/55/68

目 录

唐太宗	1
(一)唐太宗所处的时代	1
(二)晋阳起兵	6
(三)唐太宗的战略战术	10
(四)玄武門事变	21
(五)唐太宗的用人政策	24
(六)“貞觀之治”	27
(七)边疆問題和民族政策	32
(八)太宗中晚年的政治	38
武則天	47
(一)从入宮到做皇后	47
(二)从皇后到做皇帝	52

唐太宗

今天，我想分八个問題来比較全面地談一談唐太宗。

(一) 唐太宗所处的时代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在历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是推进社会的发展，还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要想了解唐太宗，就必须首先了解他的时代背景，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物质条件。

中国的封建社会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从战国到南北朝是前期，从隋唐到鴉片战争以前是后期。在前期，大族豪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部曲佃客制占居优势地位，在后期，普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佃户制占居优势地位。唐太宗处在普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佃户制形成和走向成熟的阶段。

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何时，这是史学界长期以来爭論未决的問題。个人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应从战国开始，而不是从西周开始。在西周，农业的生产工具还很落后，是用木和石制成的；施肥的知識也很有限，主要是利用腐烂了的田間杂草和草木灰作肥料。烂草和草灰的肥效不高，不能保持地力，因此，一塊田地种上三年五載就不能再种下去了，就要換一塊耕地。等到撈下来的荒地长上小树以后，人們才能重新加以利用，因为木灰肥效要比草灰肥效高一些。这种耕作制度叫作熟撈荒制。那时，每換一次耕地，人們就得大力芟一次草，除一次木。使用木石工具来挖树根，这是很困难的，个

体生产簡直无法进行，必須依靠簡單协作。所以，在西周，耦耕是習見的耕作方式。我們知道，生产过程的个体性質，这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在个体生产情况下，封建經濟所必需的，“是使直接生产者被分与一般生产資料，特别是土地；不仅如此，还必需使直接生产者束縛于土地，因为否則地主便沒有保証获得劳动人手了”。在个体生产情况下，封建制度的条件是“农民对地主的人格依賴。如果地主沒有直接支配农民人格的权力，他就不能强迫被分与土地而自行經營的人們来为他做工。因此，必須有超經濟强制”（列宁：《俄国資本主义底发展》第三章）。由此可見，如像直接生产者与土地相結合，超經濟强制这样一些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征，也都是由生产过程的个体性質所規定的。西周既然还不具备个体生产的条件，当然也就不可能进入封建社会。关于西周的生产关系等等問題，甚为复杂，这里不能多談。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鉄制的农具出現了。最早的鉄铧犁，是在木底上套上V字形的鉄口，叫作鉄口犁。当时还出現了鉄口鋤、鉄口耜、鉄鎌刀等。这样，进行个体生产就有了可能，奴隶制下共耕共耘的劳动形式也跟着破坏了。随着生产力性質的改变，階級斗争激化起来，一系列的奴隶起义和奴隶暴动撼动了奴隶主的統治，促使列国建立起封建的政权。

鉄口犁不能深耕，只能在地上划一道沟，效率也不高。到了汉代，它逐渐为全鉄犁铧所代替。根据考古发现，那时的全鉄犁铧有大小两种形制。小的只有十厘米寬，重量还不到二市斤；大的則长寬均达四十厘米左右，重量达到十四、五市斤，最重的更在十八市斤以上。这两种大小悬殊的鉄铧犁的使用，除因地区而异之外，恐怕与农户大小也有关系。很可能，貧下的小农户一般使用单牛或由人力挽引的小犁，而地主和富裕农户則多用大犁。笨重的大犁不能由单

牛曳引，而是由双牛合耦架长轅来曳引的。汉武帝时赵过改进的耦犁，可能就是大犁的一种。据《汉书·食货志》记：“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古制，九夫之田为一井，三夫之田为一屋；一夫为田百亩，即一顷；十二夫共耕田十二顷。古以百步为亩，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古之十二顷，当汉制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其效率相当于古之十二夫，这是生产力的很大提高。但是耦犁需用二牛三人，一般贫下农户无力单独利用它，因此这种较为先进的农具就必然要对小农户发生一定的破坏作用。

古代，在中国北方，只有贵族有姓，一般奴隶是没有姓的。个体生产发展后，产生了一个个的小农户，他们的家庭都需要一个标志，他们往往就以居地为姓。过去处于同一共同体的农户，往往采用同一个姓。这样，就形成了宗族聚居的现象（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宗族聚居是由原始公社瓦解而形成的）。宗族中一些有势力的人成为族长。族长掌握很多的耕牛农具，一方面在自己的土地上使用大犁，一方面又利用族长的地位和掌握的农具来组织农民生产，并通过这种活动逐渐把本宗族的人和他们的土地控制起来，这样就扩大了自己的势力。东汉晚年崔寔所著《四民月令》一书详细记载了洛阳附近大族豪族地主管理田庄和组织、指挥生产的情况。其中“合耦田器”一语很值得注意，它透露了大族豪强地主利用大农具来支配耕作这一道农作程序的实况。汉代以来大族豪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大体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即第一，豪强地主经营大片土地，在田庄中进行多种经营，不仅种植谷物、蔬菜、果木和经济作物，而且还有织布、酿酒、制造调味品以至药物等手工业。在他们的田庄里，还有修缮武器和农具的手工业。第二，由于豪族地主管理、监督生产，而农民在耕牛、农具上又对他们有一定程度的依赖，因此，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的部曲佃客制。第三，因为豪族地主组织生产，进行多种

經營，因此，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也是比較牢固的。

在豪族大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与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因為豪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是比較牢固的，他們在地方上有很大勢力，所以，各地的豪族地主就控制了地方。漢代郡縣長官雖由中央任免，但郡縣佐官則由郡縣長官辟用，例由本地人充當。封建國家要依靠有勢力的地主作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郡縣的實際權力逐漸被他們掌握了去。西漢末年，出現了不少世為郡縣吏的著姓。到東漢時候，更出現了一些世代公卿和世吏二千石的名門。到魏晉時期，更形成了士族門閥壟斷高官的九品中正制。

代替豪族大土地所有制和部曲佃客制的，是普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佃戶制。這種封建社會內部生產關係的變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由於生產經驗的積累和冶鐵技術的進步，過去的小鐵犁鋤逐漸發展成為重約三市斤並具有犁壁的鐵犁。這種犁犁轅不論曲直，較前都減短很多，沒有“迴轉相妨”的缺點，因而提高了耕作的速度。這種犁經過改進，比較省力，是用單牛曳引的。這種犁的生產效率比大犁鋤更高，它提高了精耕細作的水平，加強了農民在生產上的獨立性。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已不需要地主用“合耦田器”等辦法來加以干預和監督，而大族豪強地主對農民嚴緊的人身奴役，也就成了生產發展的巨大障礙。經過長期的一系列的階級鬥爭，地主對於田莊的經營管理，農民對地主階級的人身依附關係，都比較鬆弛了。這是普通地主經濟區別於大族豪強地主的一個主要之點。

在地主不必對農業生產進行很多干預和嚴格監督的條件下，城市的繁華對他們發生了強烈的吸引力量。許多官僚和富有的地主子弟，在城市中以聲色狗馬相征逐，肆情揮霍，肆意浪遊，到用費不夠時，就要出賣田產。與此同時，政治制度也有很大變化，普通地主不能再像前代門閥大族那樣，世世代代地壟斷政權；要想取得

高官厚祿，還必須參加科舉和吏部考試。因此，“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復蔭，多至貧寒”。一般地主子弟為了進京參加考試，“貨鬻田產，竭家贏糧”，往往“未及數舉，索然已空”，成為當時人極為注意的現象。地主的起落不常，土地所有權轉移的加速，以及由此產生的佃戶與普通地主關係的非世襲的性質，是普通地主區別於豪族地主經濟的另一個主要之點。

從大族豪強地主土地所有制走向崩潰到普通地主土地所有制發展成熟，中間有一個過渡的階段，這就是北朝到隋唐實行均田制的時期。

從北魏中年到隋末唐初的一百三十多年中，儘管大族豪強地主的經濟、政治力量曾經有過起伏，但社會發展的總的趨勢是均田農民在總人口中所占分量逐漸增長。這是因為大族豪強地主經濟衰落和崩潰的速度，要超過普通地主經濟成長和發展的速度。大族豪強地主經濟已經由衰落走向崩潰，而普通地主則不論在政治上或是在經濟上，都還沒有強大到能夠進行大規模的土地兼併，以控制大部分土地和農民的程度。所以，這是均田制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先後頒布的几个田令，對大族豪強地主占田數額的限制愈來愈嚴。從根本上說來，它們是有利於普通地主經濟的成長和發展的，但其突出的作用是在於破壞大族豪強地主經濟，加強封建國家對土地和農民的控制。隋文帝推行高穎創立的輸籍之法，使大量為大族豪強地主所控制的“浮客”轉化為封建國家的編民，把均田農民在總人口中所占的分量，推到一个高峰。

在唐前期的一百三十多年當中，總的趨勢是均田農民中的自耕農民在總人口中所占的分量逐漸縮小。這是因為大族豪強地主經濟已經基本上崩潰，自耕農民的經濟地位很不穩定，而普通地主的經

济势力则在迅速上升。所以，这是均田制走向崩溃的时期。唐的均田令允许一般地主进行小规模的土地兼并，唐政府还用赐田和大量给助赏功的办法来扶植新兴地主。唐的均田令和唐政府的措施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为普通地主成熟奠定基础。

唐太宗所处的时代，就是门阀地主已经崩溃，均田农民在总人口中分量最高，普通地主逐渐趋于成熟的时期。

研究唐太宗所处的时代，还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他处于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这个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推翻了一个既富且强的隋朝，并把均田农民的数量推向最高峰。了解这一点对评价唐太宗十分重要，下面还要分析。

唐初，门阀地主虽然已经崩溃，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门阀观念，在社会上还有着广泛的影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唐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高门，有着浓厚的门阀观点。对于时代和家庭给予唐太宗的这种局限，在评价唐太宗时，也是需要注意的。

（二）晋阳起兵

晋阳起兵的密谋是创建唐朝的开端。因此，要想全面地分析唐太宗，就必须从晋阳起兵谈起。

唐太宗的皇位不是由合法继承得来，而是通过杀兄逼父取得的。这种行动不合乎封建法和封建伦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就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因此，唐太宗在夺得皇位以后，就着手修改国史，来为自己辩护。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大事铺陈太宗在武德时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在创建唐朝过程中作出的成绩，并且大大贬低高祖的作用，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但是这样仍然不足说明太宗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于是他们又把修改国史的着眼点放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面。他们歪曲地把晋阳起兵的密

謀描繪成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則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其目的在于把太宗說成李唐王业的真正的奠基人，使他的皇位获得近似汉高祖自为皇帝而尊其父为太上皇那样的合法性。

晋阳起兵是叛隋的活动，是在极端隐蔽的情况下策划的，其真相本不易知，及經貞观史臣篡改国史以后，就更加难于探明它的究竟。所幸的是留下的史料还不算少，我們还可以設法去伪存真，从中看出基本情况。現在就把有关的史实依照時間前后編列并加以分析如下。在这里应该申明一点，下面所列的史实年代，有的和旧史的記載不尽相同，这是經過个人考訂推定的，因为時間关系，就不多談了。

隋煬帝发动的大規模进攻高丽的不义战争是极其不得人心的。早在加紧进攻高丽准备工作的大业七年（六一一年），在山东地区就已經爆发了农民起义。此后两年中，他两度大举进攻高丽，都遭到了惨敗，人民的反抗斗争愈加强烈。在这种形势之下，統治階級的內部也有了分化。大业九年貴族楊玄感的反隋起兵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約略与此同时，李淵也看到隋的統治不稳，开始动了反隋的念头。楊玄感起兵以前，他以卫尉少卿在怀远鎮（今辽宁朝阳附近）督运，当路过涿郡（今北京）时，就曾与宇文士及夜中密論过天下大事；楊玄感起兵以后，他受命代替楊玄感亲戚元弘嗣为弘化郡（郡治在今甘肃庆阳）留守，握有关右十三郡之兵，他的妻兄竇抗也劝他利用这种地位起兵反隋，他只以“无为禍始”为解，却没有加以揭发。

楊玄感起兵以后，农民起义扩大到了全国范围。那时，負責鎮压农民起义的將領尽管在某些战役中能够获致胜利，但完全阻遏不了起义力量的蓬勃发展。为此，隋煬帝在大业九年和十年連續处斬了宿將魚俱罗和董純，名將吐万緒也以得罪忧憤而死。到大业十一年春，隋煬帝又以疑忌右驍卫大將軍李渾門族强盛之故，杀了他的一門三十余人。隋煬帝的这些做法又进一步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

矛盾。李渾被杀后不久，李淵受命为山西、河东撫慰大使，負責鎮壓河东一带的起义軍。这期間，副使夏侯端曾指出他处境的危險，劝他早作反隋准备。李淵的处境和魚俱罗、吐万緒、董純等完全相同，他又是西魏八大柱国之一李虎的孙子，門望之高，正不下于李渾，所以夏侯端以此来打动他，他“深然其言”。这就說明他的反隋之念比以前又进了一步。大业十二年，隋煬帝提升他作太原留守，地位高了，受到的猜忌就会更大，李淵对此是顾虑重重的。

李淵虽然早已蓄有叛隋之心，但直至大业十二年底，始終迁延不发，未尝有所举动，这和国内形势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李淵是个富有政治經驗的老官僚，是个老謀深算的宿将，他看到，隋煬帝对起义軍的力量起初估計不足，并没有竭尽全力去鎮壓，而对于貴族官僚的举兵，則极为害怕。河东和太原都是隋的軍事重鎮，靠近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如果从那里发动地方性政变，势必要引起隋煬帝的极大震动，把隋的大軍吸引过来，在时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免不了要步楊玄感起兵失敗的后尘。因此，他要靜待时机。大业十一年，农民起义軍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年，隋煬帝曾被突厥围困在雁門，从太原或河东起兵倒是有利的时机，但这样做无异于作突厥的内应，将得不到人們的支持，他不敢冒这个大不韙。到大业十二年，隋煬帝对农民起义軍的力量看到了一些，全面調整了鎮壓农民起义的軍事部署。他看到河北、山东一带的起义軍不断南流，在江淮之間发展成为巨大的力量，就自己帶領一支中央禁軍到江都鎮壓。他又把大批进攻高丽的部队調回，派楊义臣等帶領，来鎮壓山东、河北一带的起义軍。由于这个新的軍事部署，当时分散的农民起义軍曾經一度受到挫折，几支历史最长的起义軍都被隋軍打败了。当时，在全国，特别是在东方，隋軍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因此，在大业十二年年底以前，李淵还不

敢有所作为。

大业十二年冬季，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地农民起义軍經過百折不挠的战斗，逐渐由分散趋向联合。由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崗軍攻破隋的金堤关，打下滎阳郡諸属县，并一举击潰宿将张須陀帶領的劲旅，使隋的东都洛阳受到了威胁。这样，就扭轉了局势，使农民起义軍轉到占居优势的地位。各地的地主、富豪看到隋室已不可为，都起而割地自雄，想夺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許世緒、武士彠、唐俭、唐宪等晋阳一带的地主、豪商，也抱着同样的目的，紛紛劝李淵抓紧时机，尽速举兵。正在这时，李淵的軍隊在馬邑被突厥打败，隋煬帝派使者囚捕他和馬邑（山西朔县）太守王仁恭送到江都治罪。眼看着魚俱罗、董純的遭遇就要落到他头上了，于是他定下了叛隋的决心。很可能，由于东都形势的紧张，隋煬帝临时改变了他那果于誅戮宿将的做法，随即他又派使者赦免了李淵和王仁恭的罪責，并讓他們各复旧任。李淵一被释放，立刻就开始了叛隋的实际行动。

李淵从太原起兵的最大障碍是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这二人是隋煬帝的亲信，可能是隋煬帝特地派来監視李淵的。他們在太原也有一定的势力。要想从太原举兵，就得首先消除这重障碍。李淵曾經让李世民在晋阳密招豪友，但是仅仅依靠这个办法是不够的，因为这种秘密行动，規模做大了就容易被发觉，做小了又不能完成控制晋阳这座大城的任务。于是大业十三年初，他又使晋阳令刘文靜詐为敕书，謊称隋煬帝发太原、西河、雁門、馬邑諸郡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为兵，定于年終在涿郡集中去打高丽。为了避免計謀被王威、高君雅发觉，这种煽惑大致是在边郡进行的。果然，到了二月，馬邑就发生了刘武周杀掉太守王仁恭的事变。刘武周勾結突厥，向南打破楼煩郡（小西靜乐），并进取汾阳宫。李淵以防御刘

武周南下为借口，提出自行募兵的主张。王威、高君雅看到形势危急，不敢不同意。于是李淵命令李世民和他的其他党羽在晋阳募兵。这支新募的兵完全掌握在他的党羽手里，他利用这支兵控制住晋阳，杀掉了王威和高君雅。这样，他就完成了从晋阳起兵的行动。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唐高祖早就有了叛隋之心，旧史所說唐太宗李世民暗中在晋阳部署宾客，准备起兵，而高祖不知其事，等到李世民以计划告知李淵，李淵大为惊駭，甚至要执李世民送宫治罪，是不足据信的。至于旧史所記李淵对太宗說：“吾日夜思量汝言，大有理。破家灭身亦繇汝，化家为国亦繇汝”，也是虚构出来的。这正是史臣辯护太宗合法取得皇位的画龙点睛之笔。当然，年青的李世民見事敏速，行动大胆，他可能劝过李淵早日举兵，也可能糾正过李淵行动过于迟疑、稽緩的弱点。在李淵的授意下，他在組織起兵方面，也起了不小作用。这些我們也是应该承认的。

（三）唐太宗的战略战术

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正式开始了他的征战生涯。李淵从晋阳起兵南下，他就与长兄李建成分領左右軍。此后，在唐的統一全国过程中，几乎在黃河流域进行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都是他負責指揮的。他的軍事活动，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的胜利。

李世民第一次指揮的大战是对隴右的薛举、薛仁果父子的战争。

还在李淵从晋阳起兵以前，大业十三年（六一七），金城郡（治所在今甘肃兰州）的富豪薛举就已据郡城起兵。此后不久，他又占領了隴西（治所在今甘肃隴西县西南）、西平（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諸郡，称秦帝，都上邽（今天水）。約在李淵攻克长安以后的一个月左右，薛举子仁果領兵进围扶風郡城（今陕西鳳翔），被李世民击退。第二年（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六月，

薛举又来爭夺涇州（隋安定郡，治所在今甘肃涇川），李淵派李世民帶兵迎戰。

戰爭的雙方具有如下特點：

秦軍方面：第一，薛氏父子占領的隴右地區是隋的牧監所在，又是隋防禦突厥和吐谷渾的要地，所以，民習戰備，人務騎射。在他們的軍中，多有精騎驍將。這就決定了秦方軍鋒銳盛的特點。然而第二，隴右一帶，民戶寡少，生產不算發達。秦軍的後方天水、隴西、金城等郡，在隋大業盛時，合計起來，也不過七萬多戶。至於秦軍占領的平涼（治所在今寧夏固原）、安定等郡，雖然戶口稍多，但因為處在前綫，還沒有成為薛氏父子牢固掌握的地區。所以，秦的人力、物力、財力都是不足的，不能持久作戰。由是控制的民戶很少，薛氏父子幾乎沒有第二綫的兵力。

唐這時擁有关中、巴蜀和山西的廣大地區，又掌握着儲備十分豐盛的長安府軍和永豐糧倉（在渭水入黃河處）。赤岸澤（在今陝西大荔縣西南）牧監也供給了唐軍不少戰馬。同時，關中、河東一帶又是隋代府兵集中的地方。所以，唐的軍力、人力、物力、財力都遠遠超過秦軍。更重要的是，李淵不僅得到關中地主階級的支持，由於他進入長安以後，立即宣布廢除隋的苛禁，在他的統治區里，階級矛盾也初步緩和了。從而，唐的後方也是比較鞏固的。

唐、秦兩軍的第一次大會戰發生在武德元年七月，地點在高壩（今陝西長武北）。唐軍的指揮者沒有能利用秦軍的弱點，却急于求戰，又恃眾輕敵，防備不嚴。結果薛舉引軍掩襲唐軍陣後，在淺水原大敗唐軍。唐軍的士兵損失了十之六七，大將被俘的也有數人，李世民帶軍退回長安休整。

據舊史記載，這次戰役是因為李世民得瘧疾，把軍務委付給行軍長史劉文靜和司馬殷開山，他們不奉李世民堅壁不戰的教令，因

而致敗。也有可能，這是貞觀史臣為了掩飾太宗的過失，而把罪責歸之于當時已死的劉、殷二人，但不管怎樣，輕躁致敗，總給了年青的李世民以極大教訓。此後，他在歷次戰爭中都竭力保持冷靜的頭腦。

秦軍繼續向唐境進攻。八月，薛仁杲進圍寧州（隋北地郡，治所在今甘肅寧縣），被擊退。不久，薛舉死，仁杲繼立，居于析墪城（在今甘肅涇川縣東北）。唐軍休整後，再度由李世民帶領，進臨高墪。薛仁杲派大將宗羅喉領兵拒戰。

這次李世民冷靜地分析了敵我形勢，堅持了閉壁不戰的方針，不論秦軍怎樣挑戰，唐的將領怎樣請戰，他都不動搖。這樣相持了六十多天，秦軍糧盡，其將領牟君才、梁胡郎降唐。李世民摸清了秦方軍心已經動搖，就派行軍總管梁實帶領一支兵到淺水原扎營。宗羅喉正求戰不得，就想吃掉這支力量較小的軍隊，於是盡出精銳來攻。梁實軍扼據險要，堅守了幾天，宗羅喉軍大為疲困。李世民審度戰機已到，又派一支軍隊到淺水原南布陣，宗羅喉又并兵迎戰。李世民親率大軍突然從淺水原北出擊，宗羅喉引兵還戰，陣勢混亂，李世民帶領精騎沖進宗羅喉陣內，唐軍表里夾攻，呼聲動地，宗羅喉的軍隊潰散了。

為了不讓敵方散兵得到回歸析墪城，以免他們在那里堅守，李世民立即帶領輕騎二千多人以高速度進到析墪城下，扼守住涇水南岸。晚間，唐的大軍到達，渡過涇水，圍住析墪城。第二天，薛仁杲被迫歸降。

李世民遇到的第二個勁敵是代北的劉武周。

李淵從晉陽南下以前，為了解除後方的威脅，曾經向突厥稱臣。到武德二年，唐與突厥的關係發生了變化，突厥積極支持劉武周南下。於是從四月起，劉武周就對唐發動了進攻，襲陷榆次，圍困并

州（治晋阳）。那时，易州（治所在今河北易县）的宋金刚被竇建德打败，引兵投奔刘武周，这就更加壮大了刘武周的声势。唐先后派去援救并州的由李仲文、裴寂带领的军队，都被刘武周、宋金刚打败。李元吉慌忙从晋阳逃回长安，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以北的城镇，除浩州（今山西汾阳）以外，全数落到刘武周手里。十月，宋金刚进一步打下了滹州（山西翼城），夏县民吕崇茂举兵响应，据守蒲坂（今山西永济县北）的旧隋将王行本也宣布响应刘武周。到这时，唐在黄河东岸就只剩下晋西南的一隅之地了，关中受到很大震动。李渊急派李世民带兵前往拒守。十一月，李世民带领军队乘冰坚渡过黄河，驻扎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屯驻滹州的宋金刚军主力相对峙。

唐和刘武周的军事形势对比如下：

刘武周方面：第一，他的根据地代北诸郡是隋的边防要地，“人性强悍，习于戎马”。所以，他的军队，战斗力很强。他得到突厥的助力，更是如虎添翼，军锋愈加锐盛。第二，晋阳是隋朝防御突厥的后方重镇，刘武周占领了那里，就有了充足的仓粮和库帑。第三，刘方乘战胜的余威，士气也是旺盛的。但是第四，刘方是外线作战，刘武周在河东一带没有能建立起巩固的统治基础。他和河东一带的地主没有什么联系，一般人民也不拥护他。而河东在长期战争中，兴建起许多分散的城堡，粮食都集中在里面，所以，刘方要想在河东就地征粮是很困难的。宋金刚的军粮大部分都要从晋阳运来，在晋阳、滹州之间，山险重重，不论是运输粟米，或是保护粮道，都是极为艰巨的工作。

唐军方面，第一，它屡经战败，士气暂时还是低沉的，这是它的主要弱点。但是第二，在太原失陷以前，唐方除拥有巴蜀、关中以外，又兼并了隴右、河西，它的后方更加巩固了。唐的人力、军

力、物力、财力也比刘方更为优胜。第三，李渊与河东一带的地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李渊军入关前驻在河东时，比较注意军纪，这些都使得唐在河东就地征粮的条件要比刘武周一方好些。更突出的是第四，驻在柏壁唐军主力西距黄河不过百里之遙，越过黄河就是唐的根据地关中，因而，它的运粮线是极其安全的，没有多少被断绝的危险。

唐军驻屯柏壁以后，李世民仍旧采用主力军坚壁不战的方针。此外，他的最重要的部署是分遣一部分兵力在汾、隰一带活动，牵制住敌军进攻浩州的力量，使浩州的守军能够坚持下去。当时从晋阳到晋西南大致有两条交通线，其一是从晋阳（今太原镇）沿汾水西侧经清源、浩州渡汾达灵石，这就是李渊从晋阳南下时所采用的路线；另一条是从太原沿汾水东侧经榆次、平遥、介休以达灵石，约略相当于今天的同蒲线，这就是刘武周南下时所采用的路线。浩州正当西线的要冲，对东线运输的安全与否也有极大关系，因此，它就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唐军坚守浩州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这对唐军的最后获致胜利有着关键的作用。

宋金刚的军队深入晋西南，经过五个月的僵持，始终没有得到和唐军主力决战的机会，士气逐渐下落；而浩州又没有打下，粮道一直受着威胁。到武德三年春夏之交，浩州的唐军突然渡过汾水，消灭了刘武周派遣来护运的黃子英部队。他们又进一步占领了介休、平遥之间的张难堡（今张兰镇），于是，汾水东侧的运粮线又被切断了。宋金刚的军队得不到军粮供应，只得被迫北撤。

李世民得知宋金刚的军队北撤以后，立即率军追击。他对这次追击战的指挥，也是极其坚决的。在最紧要的关头，唐军甚至一昼夜且追且战，逐北二百余里，他自己甚至二日不食，三日不解甲。双方在吕州（山西霍县）、雀鼠谷（介休西南）、介休一带进行了多次